



前言

我父親秦邦禮（又名楊廉安、楊琳）是博古（秦邦憲）的胞弟，生前任國務院對外經委副主任、黨組書記，無錫人。14歲到錢莊當學徒。1924年在秦起同志領導的無錫錢業職工會任執行委員。1927年隨嚴樸同志（嚴慰冰的父親）在無錫搞農民「秋收起義」。大革命失敗後到上海尋找黨組織，在商店當店員。1930年博古、劉群先從蘇聯回到上海，推薦我父親給時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的陳雲。1931年經嚴樸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，以商人的公開身份，經營商店、出租房屋、掩護黨的重要機關和作聯絡站，從事黨的地下活動。1931年9月臨時中央政治局成立，原中央機關部分人員撤離上海前往中央蘇區，兼中央特科科長的陳雲同志派我父親前往汕頭設點，迎送過往的中央和軍委領導人，同時為蘇區採購急需物資。周恩來、張聞天、陳賡等都是經我父親中轉護送前往蘇區。1933年博古、陳雲去蘇區也是由此中轉。

1935遵義會議後，中央派陳雲、潘漢年去共產國際彙報。6月陳雲和嚴樸回到上海，找到我父親，利用聯絡站作立足點恢復中共上海組織的秘密活動。8月下旬，陳雲、嚴樸、我父親共乘同一艘船前往海參威，又乘火車住在一個包廂裡到莫斯科，在20多天的旅途中，從陳雲、嚴樸的談話中瞭解了遵義會議的情況。到莫斯科後，三人同在列寧學院學習。陳雲進了中共代表團，為正式代表；嚴樸兼任共產國際中共黨史研究室主任；我父親也被吸收為黨史研究室成員，接觸到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來往的一些文件，還親眼看到第五次反「圍剿」期間，中共中央軍委召開



博古

的幾次會議，給共產國際的報告。

1937年夏，陳雲派我父親提前回上海，準備迎接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回國，但隨著戰爭的發展，蘇聯決定派飛機直接經迪化送代表團回延安。於是陳雲命我父親結束在滬的商業活動，資金轉交武漢辦事處回延安工作。由於戰亂商鋪一時售不出去，接陳雲電催父親只好隻身先回延安，1938年春再度赴上海，結束業務，經武漢回陝北。碰巧遇到了張國燾事件，受李克農指

派參與看管張國燾一宿，瞭解到一些內情。

1938年陳雲派我父親去香港協助廖承志、潘漢年工作，任務是：轉運保衛中國同盟轉來的的募捐款和物資；做好秘密財政工作，親自將組織上交給帶往香港的黃金和外幣（如美金、英鎊等），兌換成法幣或銀元以華僑捐款的形式匯回；利用商業活動掩護物資採購，按組織下達的採購清單，購買根據地急需的物資，與華僑捐贈的物資一起運往武漢八路軍辦事處。當時博古在長江局工作，住在八路軍武漢辦事處，我父親每次押運物資去武漢並取回黃金就住在辦事處。兄弟二人才能有機會長談。博古在這些談話中，講到了在蘇區的工作、遵義會議及周恩來的談話。

正是由於父親這種獨特的經歷，使他知道不少與博古有關的事情，而其中有很多事實與我們建國後公開宣傳的多有出入，他悶在心裡不好給別人講，就給我講講。也引起了我的興趣，我後來就有意識地做些記錄。

1948年我從香港到達哈爾濱，陳雲同志安排我去東北老航校工作（參軍搞航空）。我在哈爾濱住了幾天。在這期間我幾乎天天去看望病中的嚴樸同志，聽嚴伯伯講了30年代在「江西蘇區」發生的一些事情，特別是「寧都會議」、「九月軍委會議」和「六屆五中全會」等，使我印象深刻。

1953年我到上海出差，順便去看望肖伯伯（潘漢年），他留我在他家住了幾天。晚上我問起他「遵義會議」的事情，他感慨地說：「是我去莫斯科彙報的，已經過去18年了。六中全會饒漱石批評我是自由主義，可是人不能不說話，只要不是危及黨和國家利益的話，我看也不必自我約束得那麼緊。就比如你提的問題已保密18年了，寫書寫文章的也不少了，但不真實，我今天就告訴你真相，因為這是你伯父一生最關鍵的事，你有權利知道」。於是他詳細地告訴了我關於遵義會議及湘江之役的情況，以及他所謂的「小故事」，即周恩來與博古的一次重要談話。

當然，告訴我真實故事最多的，並把我已經知道的事連貫起來的是我父親。1955年得知潘伯伯被收審後，父親心情很沉重，只說了一句話：「又是一個項英」。1959年廬山會議後，父親十分感慨地說：「這頂帽子懸在彭總頭上已經30年了」。60年代初，當父親得知毛澤東提出柯慶施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後，憂心重重地說：「一個康生就夠『熱鬧』啦，又來一個，中國共產黨厄運將至，我們也是在劫難逃啦。你不是老想問一些事情嗎，你把問題集中一下，過幾天我有空了告訴你」。

1964年父親心臟病犯了，住醫院期間斷斷續續給我連續寫了兩封長信，提綱式地告訴了一些沒有說完的故事，可惜這些信在「文革」開始後，怕被紅衛兵抄走，藏在什麼地方也覺得不妥，最後只得忍痛燒了。但是，我很理解父親，他多次給我講述過去的「往事」，就是希望我把這些真實的歷史記下來，傳下去。將來有一天能公佈於世，而不致於永遠

成為秘密。

我的這篇《往事記憶》，就是想把我一生中聽到的父輩們講的一些「歷史故事」，而其中有些故事是在我們現在看到的黨史中沒有明確闡明的，或者被「遺忘」的，或者被誤記的，在此作為「補遺」，供讀者參考。

「年難留，時易損」。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，這20多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時代在前進，半個多世紀前發生的歷史，再不應該被掩埋、被遺忘、被虛構了，應該去塵土、露真容、還歷史以真實。

本書中的內容，正如上面回顧的，是我幾十年間從各個知情人士聽來的，有些是相對完整的，有些是零散的，我做了整理、連貫使其完整，並查閱了大量黨史資料，核對日期。特別要指出的，有關遵義會議後，在「鷄鳴三省」的地方，周恩來和博古的那次重要談話，我認為對研究中共黨史有很重要的價值。這次談話的內容來源於我父親和潘漢年兩條線索，現在我把他寫出來，雖然不可能做到每一句話都是周恩來的原話，但儘量做到傳達出當事人的原意。

由於歷史原因，中共在蘇區和長征時期的文獻大多損失了。使得這段歷史的研究很難找到實證。所幸共產國際的文獻在莫斯科和北京都保存完好，一旦這些文獻開放，相信本書很多內容會得到證實。

我相信有價值的歷史資料首先要真實。

秦福銓

2000年2月26日